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际认同： 生成机理、现实挑战与优化路径

刘 凯 强

(西安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摘 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孕育的新型文明范式,为摆脱西方现代文明困境、推动全球文明转型升级提供了中国方案,是当前全球治理与文明研究的重要议题。学界现有研究多聚焦其理论内涵、内容结构与历史意义,对其国际认同建构的系统性研究较为薄弱,尚未充分揭示其国际认同的生成机理与阻滞因素,缺乏体系化、可操作的认同优化路径。基于此,以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认同效能提升为核心议题,依托文明认同与跨文化传播相关理论,采用文献分析与系统综合研究方法,深入探究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认同的现实境遇与优化路径。基于认同内涵释义与维度划分、认同内在关联逻辑解构、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认同概念界定及其类属性文明特质辩证规约的理论观照,深入探究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国际认同层面,因国家利益博弈分歧、中外文化语言隔阂、西方意识形态偏见以及传统思维惯性所面临的多重现实挑战。从认同生成的内在机理出发,系统构建利益认同、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实践认同的四维协同框架,提出全方位、可落地的国际认同优化路径。有效弥补了当前研究碎片化的缺陷,丰富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对外传播的理论体系,为消除国际认知偏见、提高国际传播力和价值引领力提供了学理支撑,也为推动全球多元文明共生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参考与指南。

关键词: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国际认同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6)04-0025-10

DOI:10.19742/j.cnki.50-1164/C.260403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分析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孕育形成的全新文明范式,是新时代中国向世界阐释文明发展新道路、贡献人类发展新方案的核心理论与实践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10}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提出要“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2]6}。自此,“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国内外学界研究的核心热点议题。在中国知网上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主题词,共检索到1187篇核心期刊文献和87篇学位论文,研究规模持续扩大、研究维度不断扩大、研究视角逐步多元。结合现有研究

收稿日期:2026-04-18

作者简介:刘凯强,男,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代化阐释研究。

基金项目: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唯物史观视域中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建构与价值贡献研究”(2024A028)

时序脉络、研究重心迁移与核心内容迭代特征,可将 2021 年以来的相关研究划分为基础本体阐释、海外认知拓展、国际传播深化三个递进阶段,各阶段研究层层推进、逐步深入,构建起“理论阐释—现状研判—路径探析”的基础研究框架,但整体研究仍存在结构性短板与内容缺口,为本研究的创新性探索提供了充足的学术空间。

第一阶段为基础研究阶段(2021—2022 年),核心研究范式以本体论阐释为主,聚焦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础理论体系建构,从多维视角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3]、理论内涵^[4]、基本特征^[5]、文明超越性^[6]与世界意义^[7]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系统解释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源性问题。同时,学界立足关联理论视域,对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8]、中国式现代化^[9]、人类命运共同体^[10]的关系进行了辩证分析,并通过理念、过程及结果的动态比较^[11]来论证其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独特性和超越性,初步搭建起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础理论分析体系,为后续海外认知、国际认同、跨文明传播等拓展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但从研究结构来看,本阶段研究存在重本体、轻认同的结构性缺陷,研究场域局限于国内理论解读,缺乏对国外受众认知、理解与认同情况的关注,研究视角相对单一。

第二阶段是拓展研究阶段(2022—2025 年),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持续提升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传播进程稳步推进,学界研究完成了从基础理论本体研究向国际认知分层研判、海外认同现状分析的迭代升级,有效弥补了前期研究“重国内轻国外”的短板。该阶段研究聚焦国际场域的认知现状,形成三类核心研究成果:一是系统研究海外左翼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知^[12],系统梳理国外特定人群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识和理解;二是从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对中国国情的了解程度^[13],以及现代化道路的差异性与国际关系理念的本质区别^[14]等方面剖析国外公众对人类文明新形态认知偏差的成因;三是整合国际学术研讨成果,呈现国际友人、国外学界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真实理解与价值体悟,客观呈现该文明范式的国际传播图景^[15]。整体而言,第二阶段研究实现了从理论建构到现实研判的突破,但研究层次较为浅显,核心局限在于仅聚焦现实状况的客观呈现与表层归因,未深入探究国外认知背后的认同结构差异、深层认知矛盾、跨文明传播困境等核心问题,也未结合现实研判开展针对性、系统性的认同路径探究,未能形成完整的研究闭环。

第三阶段为深化研究阶段(2025 年后),学界研究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国外现状描摹转向国际传播的优化探索,研究导向从“问题研判”转向“路径探析”。随着国际传播与海外认知研究体系逐步成熟,学界不再局限于认知现状与偏差成因的分析,开始聚焦如何破解传播壁垒、提升国际传播的实践性问题,形成了多维度的路径探索成果。现有研究主要从三大方向构建提升策略:一是立足国际话语权和话语传播维度,探索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权提升路径^[16]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体系与叙事体系^[17]的建构路径;二是立足文明交流维度,依托中外文明互鉴^[18]构建人类文明发展新格局^[19]和人类命运共同体^[20],破解文明隔阂与认知对立问题;三是立足技术赋能维度,探索借助数字化传播^[21]、以人工智能强大的算力和算法^[22]等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尽管现阶段研究实现了从“现状分析”到“路径建构”的进阶,但相关探讨多囿于传播维度的单一视角,尚未系统厘清国际认同建构的复合型驱动要素。尤其缺少针对国际认同生成机理、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的深入研究。

系统梳理 2021 年以来人类文明新形态领域的研究演进逻辑可知,学界已历经“基础本体研究—海外认知研究—传播路径研究”的三阶迭代,初步搭建起“理论阐释—现状研判—路径探究”的完整分析框架,研究广度持续拓展、研究维度不断丰富。但纵观整体研究体系,现有成果仍存在核心短板:其一,研究重现象描述、轻机理剖析,对国际认同的层级结构、内在生成逻辑、认知分歧内核缺乏系统性分析;其二,现有路径研究多围绕国际传播单一维度展开,缺乏系统性、针对性、可落地的认同路径方案;其三,鲜有研究立足外部国际视角,深挖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认同的底层逻辑与深层困境,难以有效回应新时代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凝聚全球文明共识的现实需求。基于现有研究的成果积累与核心短板,本研究以国际外部视角为核心切入点,聚焦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认同路径优化这一核心议题,遵循“机理阐释—

问题剖析—路径优化”的完整研究逻辑链条,深度探析国际认同生成、演化、偏差形成的内在机理,系统剖析国际认同层级结构与核心困境,以此突破现有研究在深层结构分析与系统性路径建构方面的瓶颈。基于此,本研究旨在弥补当前学界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认同研究的薄弱环节,有效拓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研究视域与研究深度。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认同的生成机理

厘清认同的生成机理是探析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认同的逻辑前提。我们以利益、情感、价值、实践四维认同为分析范式,在阐释认同基本概念、厘清各类认同关系、界定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认同专属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类属性与辩证特质,从而夯实理论基底,为剖析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认同现实困境、探寻优化路径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一) 内涵释义:认同的定义与维度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审视,认同是主体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对客体产生认知接纳、情感归属、价值肯定与行为遵从的社会关系范畴,是主观认识与客观实践辩证统一的综合性演化过程。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3]501} 认同并非单纯的精神心理活动,而是根植于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与交往关系,伴随着物质生产、精神交往、社会实践而不断生成与深化,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社会性和历史性。从生成过程来看,认同是思想观念逐步形成、内化并自觉转化为行动的动态进阶过程,内在地包含利益认同、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和实践认同四个维度,呈现为由浅入深、由外及内的动态演进规律。具体而言,主体往往因现实利益驱使而产生对“他者”靠近与接触的意愿,物质利益成为人际、群体乃至国家间互动的原始动因;在持续性交往互动中逐步消解认知隔阂,形成情感依赖与心理信任,构筑稳固的情感联结;继而在情感共鸣的基础上接纳、认可其思想理念,达成价值层面的共识与认同;最终将思想认知外化于行,转化为自觉的实践活动。从构成维度来看,认同是四维认同共同构筑的有机复合系统。其中,利益认同是通过客观物质利益的契合性来实现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3]286},利益联结是认同生成的首要逻辑起点;情感认同是主体在长期交往实践中形成的社会性情感联结,是弱化认知隔阂、拉近主体关系的心理纽带;价值认同属于高层次意识形态认同,是主体在理念层面达成的精神共识,决定认同的稳定程度与认同深度;实践认同彰显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内核,是主观认知转化为客观行为的外在表征,也是检验、巩固、优化认同的根本保障。四个维度的认同相互渗透、依存共生、协同作用,共同构成认同分析的基础理论范式。

(二) 逻辑解构:认同之间的内在关联

依据辩证唯物主义联系观,利益、情感、价值、实践认同并非孤立割裂的单一要素,也不是简单并列关系,而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螺旋式上升的辩证逻辑,形成闭环式认同演化机制。简言之,认同体系以利益认同为基础、情感认同为纽带、价值认同为核心、实践认同为归宿,四维认同有机统一、相互协同、缺一不可。其一,利益认同为底层逻辑根基。马克思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4]187} 客观利益契合是催生情感好感、凝聚价值共识的先决条件,脱离物质利益支撑的认同只是抽象、空洞的主观想象。其二,情感认同为中间过渡纽带。情感作为社会性心理意识,能够调和利益矛盾、消解认知偏见,打通从功利性利益认知向超越性价值认同的转化通道,缓和主体间的交往隔阂。其三,价值认同为内在核心统领。价值理念决定认同的精神向度,能够整合多元利益诉求、升华社会性情感,推动认同从浅层被动接纳转向深层主动信奉,是维系长期稳定认同的关键。其四,实践认同为外在实现表现。“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3]501} 实践是认同生成、检验、发展的根本途径。一切认同最终只有落实到行动层面才具备现实意义,因此实践认同不仅是主观共识转化为客观行动的外在表现,

更是检验前三种认同是否达成的“试金石”。“实践认同作为理念认同的最终落脚点,重在把理论认知与情感积淀转化为持续稳定、可复制的实际行动。”^[25]与此同时,它又通过实践反馈反向修正认知、巩固情感、升华价值,实现认同的动态迭代。总体来看,四维认同构建起“基础—纽带—核心—归宿”的完整认同结构体系,既遵循从物质到精神、从主观到客观的认知规律,又体现了知行合一、相互促进的辩证特质。

(三)概念界定: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认同

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认同是一般认同理论在国际文明交往场域中的特殊延展,亦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深度融入全球治理实践的理论凝练与学理升华。相较于一般性认同,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认同以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国际公众为多元主体,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认同客体,本质是国际行为体在文明互动中形成的认可与接纳、情感归属与协同践行的综合性关系。依托前文利益、情感、价值、实践四维认同分析框架,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认同的内在意蕴进行分层解析。在利益维度,表现为以普惠共赢为内核的发展利益认同,摒弃资本逻辑主导的零和博弈与利己优先旧式范式,兼顾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体量国家的合理诉求与正当权益,谋求全人类共同发展福祉。在情感维度,表现为以文明互鉴为底色的文化情感认同,践行“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26]²⁵⁸的文明交往原则,破除西方文明优越论与文明霸权叙事偏见,消解东西方文化隔阂与认知疏离,塑造平等尊重和共生的新型文明交往情感纽带。在价值维度,表现为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核心的理念认同,“全人类共同价值蕴含着人类发展进步所积淀的共同理念,勾勒出超越差异分歧的价值同心圆”^[27]⁶⁰,为破解全球价值撕裂难题提供精神指引。在实践维度,表现为以共建共治共享为遵循的行动认同,推动各国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变革、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将理念层面的文明共识转化为协同共进、务实有为的治理实践。由此可见,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认同既遵循认同生成的一般规律,又彰显自身独有的理论品格,集中凸显出公共性、普惠性、超越性与实践性等马克思主义文明特质,为消解文明冲突、弥合价值分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动世界文明有序演进提供了坚实的认同基础与文明支撑。

(四)文明特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类属性辩证规约

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指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28]²⁵⁷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民族特殊性与人类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关系,阐明民族实践绝非孤立的地域性活动,本质上都属于人类文明总体演进进程。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共产党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的伟大贡献,尽管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场域中孕育生成的,但蕴含着全人类共同生存发展需求的普遍性价值,实现了文明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内在统一、历史贯通与实践自洽,“是人类文明普遍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展现的文明特殊性的历史与实践的证成”^[29]。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整体性思维,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出鲜明的“类”属性,也就是超越局部范畴的人类总体属性。它基于“人类”这一整体性范畴来审视国家、地域及各民族文明间的关系,打破了西方传统文明理论中地域本位、民族本位、资本本位的局限性,摒弃了单一文明霸权、文明优劣对立、零和博弈的陈旧文明逻辑,进而关切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需求和发展利益,提升和开拓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理论高度和实践层次,构成了世界性集体认同的现实基础。需要明确的是,承认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不意味着将其固化为适用于全球的统一文明模板,如果片面地将其绝对化、模式化、标签化,极易陷入民族本位主义的狭隘桎梏,甚至滋生“新文明中心主义”。因此,我们所说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迥异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人类文明“新样态”,它所要传递的也并非向他国强制输入具体的中国模式和方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30]⁴³⁶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示范意义,仅在于在向他国分享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炼的一般方法论,这就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构建具有自身特点的现代文明类型提供了参考和借鉴,而认同也正是从这个层面而言的。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认同的现实挑战

当前,我们正处于“两个大局”交织叠加的时代场域,国际局势波谲云诡、风云变幻。在这一国际背景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际认同面临国家间尖锐的物质利益分歧、难以逾越的语言文化隔阂、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以及盘根错节的思维惯性等多重掣肘。

(一) 博弈与竞争:不同国家利益之间的分歧与矛盾

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核心内容。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指出:“只要这个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话语就只能是国家利益。”^{[31]94} 在国际社会中,各国追求自身利益时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这些利益往往涉及能源安全、经济利益、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比如: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问题、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和科技战、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之间的代理人战争,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国家利益的冲突并不是单一维度的,而是多种因素交织叠加起来的,呈现出多极博弈与秩序重构交织并行的复杂情形。国家利益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使得国际社会呈现出撕裂和分离的趋势,从而影响国际社会对于共同理念及价值观的认同。首先,国家利益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引发全球范围内能源、粮食与金融领域的阵营分化,很多中间国家被迫“选边站队”,导致在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公共卫生、网络安全等方面原本就脆弱的全球合作几乎陷入停滞状态。其次,部分国家为保护自身利益(技术安全、产业链安全),推动“筑墙设垒”“脱钩断链”“毁约退群”,导致民族主义的回潮和全球化的倒退,使本国民众更易于接受“本国利益至上”“本民族利益第一”的叙事逻辑,而非关注全人类共同发展主题。最后,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大国对同一事件构建出完全不同的叙事,信息茧房和算法推荐加剧了这种分裂。民众接收到的不是共同事实,而是被本国利益筛选后的“真相”,这使得构建共同认同的对话基础不复存在。由此可见,国家间日益凸显的利益分歧与结构性矛盾,导致部分国家为维护本国利益,而采取一系列单边或对抗性的政策和行动。这种行为不仅侵蚀了全球性多边对话和合作的基础,也严重阻碍了国际社会就人类文明发展问题共识的凝聚,极大地稀释、延缓甚至阻碍了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际认同进程。

(二) 误解与误读:中外语言表达方式和文化的差异

在全球叙事日益呈现跨民族、跨地域、跨文化深度交融的背景下,各国独特的文化语境、历史积淀与思维范式形成了彼此迥异的价值取向与认知结构,这就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际传播带来了深层次的跨文化对话困境。在国际传播中,语言表达方式和文化背景绝非简单的“工具”与“环境”,而是传播成功的核心和灵魂。若忽视这两者,轻则使传播效果大打折扣,重则引发误解、矛盾和对抗,甚至酿成外交事件。从中西方语言表达方式差异来看,汉语“重意会,轻言传,重心理意念而不重形式结构”^{[32]275},注重“弦外之音”和“情境体悟”,表达方式更为含蓄、委婉。英语主要依靠清晰、直接、明确的字词和语句,注重形式结构的协调,表达也更为直接、坦率。同时,语言本身的文化差异也是跨文化叙事最大的障碍,如:“龙”在中国是祥瑞与力量的象征,但是当它被翻译成“dragon”之后,其文化内涵就出现了扭曲与错位。因为西方文化中的“dragon”通常指一种邪恶的爬行动物,这样的简单对应,导致中国这一积极的精神图腾,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被蒙上了一层不应有的负面色彩。从中西方文化差异来看,中国文化偏向集体主义,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注重和谐、互助、家庭和社会的整体性。西方文化偏向个人本位,强调个人价值、个人权利、个人利益。文化观念的多元性既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也在国际传播中构成了一种内在张力。当不同意义体系的文化相遇时,如果缺乏有效的对话机制,极易在跨文化传播中衍生出认知鸿沟与符号误判,使原本中性的差异演变为公开的对立。由此可见,中西方语言表达方式和文化的差异导致话语内容在国际传播中产生偏差和误解,使诉诸情感的传播的方式难以引起受众共鸣,从而影响国际受众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知和认同。

(三) 漠视与诋毁: 西方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偏见

“意识形态偏见是导致价值认同隔阂的深层根源。”^[33] 作为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从根本上与资本主义相对立。冷战期间,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留下了深刻的意识形态分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怀疑与敌视态度一直延续至今。在现实中,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坚持集体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理念, 并以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而西方国家大多奉行资本主义制度, 强调个人主义、多党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等, 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明显疲软、无力和后劲不足。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差异, 使得部分西方国家难以理解和接受中国的发展道路, 并害怕其发展取代了自身的世界霸权地位, 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偏见、歧视和敌意。加之受西方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 西方国家的部分媒体往往对中国进行诋毁、攻击和抹黑, 宣扬“中国崩溃论”“中国模仿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不确定论”, 由此形成了许多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话语偏见。这种长期的、错误的信息轰炸, 使得西方民众无法真正了解真实的中国, 对中国产生反感与敌对情绪。比如: 一些西方国家凭借其国际话语霸权和国际媒体控制权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污名化, 把旨在振兴地区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说成是“有地缘政治色彩”的经济计划, 其目的是“意识形态输出”。而与之相对的是, 人类文明新形态将“人民至上”作为其内在属性与价值根基, 强调在不同文明间求同存异、构建利益共同体, 以及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这种根本路径上的不同, 必然会引发西方世界的抵触与反对, 从而偏执地认为中国的发展以及所提倡的理念“会撞倒自己、会堵了自己的路、会占了自己的地盘”^[34]。可见, 意识形态的偏见使西方国家对中国产生反感与敌对情绪, “使西方世界无法客观、正确地看待中国所提出的新概念、新表述, 这也阻碍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国际社会的接受与认可。”^[35]

(四) 矛盾与纠结: 历史思维惯性阻滞理念付诸实践

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一种新兴的文明发展范式, 在国际社会上既遭受着西方发达国家的歪曲与攻击, 又面临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观望与质疑。由于历史、地缘、经济、舆论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一些发展中国家仍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心存疑虑, 对中国所提倡的新发展理念和倡议保持观望态度。虽然中国一直秉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强调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但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曾长期被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奴役和侵略, 对西方文化的认同根深蒂固, 因此, 面对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 这些国家在西方传统“国强必霸”历史叙事与“中国威胁论”的双重交织影响下, 对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国际倡议存在质疑, 担心中国会走上西方“国强必霸”的道路。并且, 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及西方所谓的“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经济见顶论”与“产能过剩论”等言论的渲染下, 一些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感到疑虑。他们一方面担忧中国经济能否持续稳健增长; 另一方面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步伐存有观望态度。部分国家甚至反思自身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是否存在过度依赖, 从而对其在此过程中所面临的机遇和利益保障感到不安。同时, 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存在矛盾认知, 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相似的历史经历和共同诉求, 因此对人类文明新形态总体上持肯定态度, “但由于中国与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传统习俗等方面存在差异, 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担心其对本国产生冲击”^[36], 对中国存在严重的戒备心理, 并且难以真正理解迥异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思想上的动摇就会导致行动上的不坚定, 从而使一些国家对人类文明新形态难以真正实现实践认同。

四、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认同的优化路径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际认同, 主要是指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接受、认可和

赞同。为了实现这一认同,我们就要从利益认同、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实践认同等方面精准发力,不断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认同的优化路径。

(一) 利益共享:互利共赢激发利益认同

利益认同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认同的“发动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际合作理念之所以被接纳,是因为它确实为共建国家带来了福祉,这种基于互利共赢的认可,是其走向普遍认同最有力的证明。在国际社会上,“中国所追求的,不是单方面的受益,而是互利共赢;不是打造‘中心’与‘附庸’,而是构建携手共进的伙伴网络”^[37]。通过加强经济贸易合作、拓宽双向投资渠道以及提供发展援助等一系列举措,既为全球经济的增长注入强大动力,又很好地满足了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关切和发展需求。一方面,中国借助广泛的国际贸易合作,不仅使自身经济影响力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上升,而且使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得到大幅增强。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合作框架与机制,中国构建起了庞大的经济合作网络,同众多国家深化在基础设施建设、金融联通以及贸易往来等领域合作,从而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发展模式的认同度与国际合作的参与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更多考虑和照顾其他国家利益”^{[38]501}“努力打造利益共同体”^{[38]502},这些举措既有利于推动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也彰显了我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为我国创造了良好的国际交流氛围。另一方面,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中,中国将投资援助与可持续发展议程紧密联系起来。“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高质量建设中吉乌铁路、匈塞铁路等项目”^[39],同时在津巴布韦等国的实践表明,从直接的医疗卫生、人道主义援助,到帮助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再到旨在提升内生动力的长期发展倡议等,中国的参与正在帮助合作伙伴缩小关键的发展差距,进而为其应对全球性挑战增添信心和力量。这些贸易合作和经济援助体现了中国坚持合作共赢的新发展理念,为伙伴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实质性支持,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理念的对外传播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进一步促进了人类的文明互鉴与共同发展。

(二) 情感共鸣:文化融通促进情感认同

情感认同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认同的“黏合剂”。“共情是一种人类基因中固有的进行沟通的原始能力,体现了人类之间渴求相互理解的精神需求。”^[40]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空中楼阁,它必须借助具体的、可感知的、能体味的文化载体来展现自身,依靠柔性策略与柔性方式打动世界人民,从而达到情感上的共鸣与认同。“在当代世界,文化认同与其他方面的认同相比,其重要性显著增强。”^{[41]108}与政治上的说教与传播、物质上的援助与合作相比,文化具有润物细无声的特质,它更容易跨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藩篱,直击人心,引发情感的共鸣。文化融通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并获得情感认同的必由之路,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第一,加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转译能力,从文化视角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对世界发展作出贡献的故事,缩小不同地域背景下的认知差异,打破西方意识形态话语滤镜,塑造和展示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增进国际社会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情感认同。第二,文化融通能够精准地挖掘并呈现这些“共通情感”,一部讲述亲情的电影(如《你好,李焕英》)、一个关于保护生态的故事(如“云南大象北迁事件”)、一项惠及民生的国际合作项目(如中国与有关国家互办文化和旅游年)都能绕过意识形态的差异,快速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直接触动人类共通的情感神经,创造“我们虽然不同,但我们感受相通”的契机,实现从“感动”到“共情”再到“认同”的动态生成。第三,文化融通创造出无数共享的文化空间与体验,共同庆祝节日、共同分享潮流、共同创作作品等经历构成了新的文化记忆和集体记忆,编织起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增强各国民众的情感联结,实现跨时空、跨圈层、跨文化群体的共情效应,让人们在文化记忆到情感认同的路径中找到情感归属。第四,中华文明里“天人合一”“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等智慧,通过文化融通为世界提供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另一种思路与方案,有效提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中国方案的认可度。当一种文明被证实能为

人类共同未来提供有益启示和借鉴时,国际民众就会对其产生信任感、依赖感和正向的情感期待,这是更高层次的情感认同。

(三) 价值共振:共同价值引领价值认同

价值认同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认同的“领航器”。价值认同是指主体在心理层面接纳、赞同并支持某种共同价值观念,进而形成内在一致的价值共识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38]522}“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超越了西方“二元对立”“文明冲突”的思维定式,更打破了由此造成的文明隔阂,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凝聚起为不同地域、民族与国家所普遍认同的价值共识。“全人类共同价值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和平、发展’是人类的生存价值观,‘公平、正义’是人类的社会价值观,‘民主、自由’是人类的政治价值观。”^[42]这三个层次互为条件,在相互融合中进一步提升中国主张、中国方案的国际认同度。首先,在价值观纷繁复杂,甚至激烈碰撞的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等共同价值为全球对话提供了一个坚实的、不易引起争议的起点。各国人民普遍都希望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都渴望实现持续的发展。以此为基石,可以减少误解,扩大合作,使各国的利益都能通过合作共赢实现最大化,从而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际认同奠定信任基础。其次,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存在诸多不公正不合理之处。共同价值中的“公平、正义”原则,为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等机构提供了明确的价值导向,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包容、普惠、平衡的方向发展。在这一改革过程中,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会切实体会到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秩序观带来的正义,从而增强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认同。最后,“民主、自由”是共同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共同价值理念反对将其单一化、工具化、意识形态化。它承认各国的国情不同,实现民主和自由的形式也必然多种多样。因此,各国都有权利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自由和民主形式。这种包容性理解,有助于打破“西方模式=唯一正确模式”的神话,推动形成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广泛国际认同。

(四) 实践共行:付诸行动实现实践认同

实践认同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认同的“落脚点”。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抽象、空洞的概念,而是蕴含着“四大全球倡议”“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体思想理念的有机统一体,而对这些思想理念的践行就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认同。从目前情况来看,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对人类文明新形态抱有更高的认同和期待。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之后,“得到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近百个国家响应和支持”^{[43]4},提出三年来,“已经动员近 200 亿美元发展资金,开展了 1 100 多个项目”^{[2]427},尤其是引起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鸣,产生广泛而长久的国际影响,“全球安全倡议”是在 2022 年 4 月 21 日提出的,得到了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中国用实际行动回应了世界人民的安全愿望。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以后,中国积极促成倡议落地,这一倡议逐渐获得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广泛支持。2025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实践指引。“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实践中,中国成功斡旋沙特同伊朗和解,中国维和军队的足迹遍布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向非盟提供无偿军事援助,坚持劝和促谈,积极推动乌克兰危机和平解决等。”^[44]这不仅体现了中国日益强大的国际影响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给各国协同解决发展问题提供了切实帮助。再者,各国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引领,致力于打造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成了对共同价值的遵循和实践,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际认同提供了实践基础。此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同时也得到各国广泛认同,还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产生日益广泛而深刻的国际影响。截至 2023 年 8 月 24 日,“我国已与 152 个国家和 32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200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覆盖我国 83% 的建交国”^[45]。由此可见,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认同度不断上升,其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正在汇聚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引领着全人类的集体合作与共同实践。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 [3] 田鹏颖,武雯婧.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J].科学社会主义,2021(6):74-80.
- [4] 谢晓娟,冯贺.深刻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丰富内涵[J].人民论坛,2021(35):53-55.
- [5] 陈金龙.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特征[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5-10,2+150.
- [6] 牛志宁,崔佳.比较视野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及其多重超越[J].行政论坛,2024(3):23-32.
- [7] 王晓.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6):9-16,181.
- [8] 谢富胜,匡晓璐.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5):10-23.
- [9] 袁红英.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逻辑[J].东岳论丛,2022(12):5-16.
- [10] 党锐锋,李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原创性贡献和方法论启示[J].宁夏社会科学,2022(3):30-37.
- [11] 吴艳东,廖小丹.精神利益与精神富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特征[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7-38.
- [12] 焦佩,田安琪.海外左翼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知研究[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11):85-96.
- [13] 杨增崇,严雯瀚.海外学者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识及其评析[J].国外理论动态,2024(5):3-14.
- [14] 杨娜,邓与同.中国式现代化的对外叙事困境与文明叙事建构——基于中美战略叙事的分析视角[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5(2):162-168.
- [15] 刘有升.以中国智慧和方案为人类文明进步注入磅礴伟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性价值与世界社会主义国际学术会议”综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12):150-152.
- [16] 王强.论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路径——基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6(5):143-152.
- [17] 谢春涛.比较现代化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语体系与叙事体系[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11):28-41,122.
- [18] 吴舒婷,吴艳东.文明互鉴论对文明冲突论的内在超越[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6):28-34.
- [19] 来庆立.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意蕴及其世界历史意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6(2):26-32,201.
- [20] 郭云泽,刘同舫.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三个基本问题辨析[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5(4):69-78.
- [21] 徐凤琴.论数字化助推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逻辑理据、功能运用与实践要求[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6):74-84.
- [22] 陈东琼,张洪钰.论人类文明新形态叙事体系的建构[J].新疆社会科学,2025(2):120-126,172.
-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5] 李宏伟,刘欢.数字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现实契机、风险隐忧及规制路向[J].人文杂志,2026(1):13-24.
- [2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27]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5.
-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29] 杨月朗,丁匡一.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体性维度[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5(2):15-23.
- [3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31] 斯坦利·霍夫曼.当代国际关系理论[M].林伟成,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32] 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增订本)[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 [33] 曹洪军,陈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国际认同的逻辑与进路[J].马克思主义哲学,2026(1):113-120.
- [34] 习近平.携手追寻中澳发展梦想并肩实现地区繁荣稳定——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4-11-18(2).
- [35] 任庆亮,严功军.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传播的机遇、挑战与话语实践[J].重庆社会科学,2024(5):73-82.
- [36] 冯海涛,贾付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挑战、机遇与方略[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20-28.
- [37] 崔唯航.全球南方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6(3):54-58.

- [3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3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N].人民日报,2026-03-14(1).
- [40] 王嘉.超越巴别塔:共情传播视角下中国故事的国际化叙事研究[J].新闻春秋,2022(3):63-70.
- [41]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 [42] 贺智慧.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认同:理念与路径[J].湖南社会科学,2023(1):9-14.
- [43] 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44] 邓海龙.四大全球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框架与协同机制[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6):217-229.
- [45] 我国已与152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EB/OL].(2023-08-24)[2025-09-29].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308/content_6899977.htm.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Generating Mechanism, Current Challenges and Optimization Pathways

Liu Kaiqiang

(School of Marxism, 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54, China)

Abstract: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is a novel model of civilization nurtured by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providing a Chinese solution to the predicament of Western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offering a blueprint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global civilization. It is a significant topic in current global governance and civilization studies. Existing academic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its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content structure,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while systematic studi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are relatively weak. The generating mechanisms and obstructive factors of its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have not been fully revealed, and there is a lack of systematic and operational paths for recognition optimization. Based on this, we take the enhanc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effectiveness of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as the core issue, relying on theories related to civilization recognition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using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systematic comprehensive research methods to deeply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optimization paths of its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The articl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and dimension division of recognition,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l logical connection of recogniti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dialectical regulation of its civilizational traits, deeply explores the multiple practical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level due to the divergence of national interests, the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barrier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e ideological biases of the West, and the inertia of traditional fixed thinking. Starting from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recognition generation, a four-dimensional collaborative framework of interest recognition, emotional recognition, value recognition, and practical recognition is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ed, and a comprehensive and operational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ptimization path is proposed. This effectively fills the fragmented gap in existing research,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external communication of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eliminating international cognitive biases and enhancing it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value leadership, and also offers practical references and guidelines for promoting the co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global diverse civilizations.

Keywords: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责任编辑:左福生]